

壹 家族映射着时代和社会

羊城晚报：年届耄耋，您为什么会离开原来的学术轨道，写这样一本家族散文？

刘登翰：写这本书有一些潜在的背景和因缘。我出生在一个世代过番的华侨家庭，自太祖父澄洋公于清咸丰丁巳年(1857年)赴菲谋生，此后数代都循着太祖父的足迹到菲律宾谋生。家族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人到异邦，必须回老家娶妻生子，把根留住。待儿子成丁或小、初中毕业，再到菲律宾继业谋生。只是到了我这一代，世事变迁，已没了“过番”这一说。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1948年秋天二弟出生，父亲回来看望，不久又要赴菲。我随母亲到太古码头送别父亲，自此成为永诀。1956年(恰是我太祖父赴菲的百年)，我离家北上读书，此时父亲已隔在大洋那边七八年。伤离和苦守，是所有普通华侨人家的宿命。负笈北上，在北大完成了五年学业，我为了帮助照顾母亲和三个尚在读书的弟弟，要求分配回厦门，却由于档案里一句“海外关系复杂”，被分配到闽西北山区，一待二十年。此时我才意识到，即使我和父亲关系再淡漠，且已失去联系十多年，但父亲就是父亲，这是一种脱不去的关系。

2009年，我真正退休时已经72岁了，手上的课题还在继续，又拖了几年才回到厦门，重新生活在亲戚故旧的温情中。历历往事，只在中夜醒来的似梦非梦中重温。我萌生了写写我的家庭、家族的心愿，可惜有点晚了，前辈亲人多已故去，留下如我一样的后辈，其实对家族先人的旧事所知不多，无处采访，只能凭借一点童年记忆和难得寻到的《族谱》和照片，以散文的方式，从点滴生发开去。因是纪实，不敢杜撰，也无法正面去写，只能说是“侧影”。这是我几十年写作生涯中，唯一为自己、为父母、为家族写的一本书。虽然是浮光掠影，挂一漏万，但希望它也能道出许多如我一样的华侨人家的心声和心声。

羊城晚报：您觉得您个人的经历、家庭的际遇、宗族的迁徙，和地域、国家、时代有怎样关系？

刘登翰：最近我们南安刘氏宗族正在修谱，邀我作序，我开头就说：“国有史，地有志，族有谱。族谱是国史和地志的一个细部和侧面”。人不能“单个”地活着，每一个人，乃至家庭，甚至家族/宗族，都活在时代和社会里，受时代和社会的影响和左右，也不同程度地映射着时代和社会。我常想，我们刘氏这个宗族，自唐至宋，两度南徙，最后在来自北方的兵戈铁马中，避难入闽而至武夷(今福建南安)，有个人(家族)特殊的命运，更是时代的驱遣。就我的家族而言，太祖父于清咸丰年间过番，也是那个“大移民”时代簇拥起的一朵浪花。

自1956年9月我们同考入北大中文系至今，我认识登翰已经67个年头。他热情、感情充沛，好结交朋友，重情义，兴趣广泛，富于探索、开创的精神和能力。大学期间他学习成绩优秀，既写诗，写散文，也编写电影剧本，是北大学生“文艺界”的知名人士。我们入学后分配在一个班，五年里大部分时间也同住一间宿舍，无论学识和为人，我都从他那里学到很多。

登翰在《侧影》这本书里，有许多笔墨深情地写他生活的城市厦门。当年在厦门，我曾寄宿登翰在中山路的家，尝过他母亲做的美味春卷。从他家步行不到十分钟就是鼓浪屿渡轮停泊的鹭江，沿着江边走道，曾听他关于生活、写作的计划，听他讲述爱情的幸福和苦楚……

上世纪90年代登翰写有《寻找生命的尊严》的散文集，偶然看到他在本书的扉页上印有这样的题记：“失去的东西是找不回来了，即便找回来，已不是原来的东西。人生是一个过程，生命便是在永远地寻找、失落，再寻找、再失



刘登翰

是『大移民』时代的一朵浪花
刘登翰：我的家族，我的家史
侧影：融合个人记忆、族谱、地方文献等，回顾逾百年家族过番史。——叶知秋，一个家族命运折射着一个国家的历史——日前，著名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学者刘登翰出版散文集《一个华侨家族的侧影》

族命运折射着一个国家的历史——叶知秋，一个家族命运折射着一个国家的历史——日前，著名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学者刘登翰出版散文集《一个华侨家族的侧影》

失去的，和寻找到的

□洪子诚

登翰《侧影》中的这些文字在写作过程中，我就陆续读到，这次集又重读一遍。他用清丽、深情的文笔，写一个家庭在大历史中的兴衰聚散，写祖辈和父辈在异国的披荆斩棘、艰难创业，写母亲在艰难岁月中对亲人的思念和抚育子女的含辛茹苦，更呈现了叙述者在回顾这一切时的执着、诚挚的信念和心灵轨迹。

登翰在《侧影》这本书里，有许多笔墨深情地写他生活的城市厦门。当年在厦门，我曾寄宿登翰在中山路的家，尝过他母亲做的美味春卷。从他家步行不到十分钟就是鼓浪屿渡轮停泊的鹭江，沿着江边走道，曾听他关于生活、写作的计划，听他讲述爱情的幸福和苦楚……

贰 散文比历史更感性

羊城晚报：为什么是用散文的文体来写家族/宗族的历史？

刘登翰：我19岁离家，浪迹江湖四五十载，岁暮耄耋才回到故乡，沐浴在亲戚故旧的温暖之中。对于家族的事，包括远在菲律宾谋生的父亲，所知不多。比如，记得母亲留下“纳卯”两字，我却完全不知“纳卯”在哪里？有幸两次受邀到菲律宾出席学术会议，都在马尼拉，从菲律宾朋友的介绍中才知道，纳卯即达沃市，棉兰老岛的首府，离马尼拉乘机还有两个小时的航程。我心心念念能到父亲坟前尽一份儿子之情、洒一杯祭奠的酒，却连墓在何处都无处询问，只能暂时搁在心中。后来终于拜托旅外同乡会的宗亲，请在纳卯的弟弟拿着父亲的名字到华人公墓逐一对照，才寻到父亲的埋骨之地。得知消息的当年，我和太太飞到纳卯，终于了却了几十年埋在心底的一点心愿。两年后又寻踪找到父亲留在纳卯的三个弟弟，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的纳卯之行，也邀纳卯的亲

人组团回厦门省亲认宗。一种虽然陌生却十分热烈的血缘亲情在彼此心中弥漫。遗憾的是我和菲律宾的几个弟弟语言不通，他们说非英语或英语，不懂闽南话和普通话。

当我由这次相会而萌生写点父母和家族的往事时，我只有从族谱中获得的一个蒙眬的家族脉络和童年留下的一点父亲的记忆。我知道这一点资料不够写史，我只能选择散文的方式，让这些点滴的记忆和资料，在我内心发酵喷发出来。而且，散文比历史更感性，更贴近人心，更展现人性。

羊城晚报：在这次写作中，有没有让您最心动、也最难于落笔的部分？

刘登翰：是关于我母亲的部分。在侨乡，男人们通过番出外，女人大多留守家园。这一去三年五载，或许就是永远。留守家园的侨乡女人，照顾老的养育小的，粗活细活都得她干，稚嫩的肩膀撑起了整片天空。她们虽说嫁为番客妇，但真正的夫妻相聚能有几年，甚至几月或几天？这是许多普通母亲的宿命。母亲也是这样，她生于上世纪20年代，正是厦门开始现代化改造的时候，母亲得以接受现代教育，喜欢篮球，甚至到过菲律宾。然而当她一旦嫁为番客妇，一切便都放下了。父亲远行，留给母亲的是四个还不懂事的孩子，我和二弟对父亲还有点印象，三弟、四弟根本就不认得父亲长什么样。漫长岁月里，在失去父亲的经济来源之后，完全只靠母亲的一双巧手撑起这个有四个儿子的家。其背后经济上的压力和艰辛，可以想象，但心灵上的孤单和折磨，谁能知道！此生我有负最多的就是母亲。

羊城晚报：谢冕说您“把内心的复杂和悲凉放置于人们察觉不到的暗处，而把明亮的色彩，以及内心的坚定与热爱展开在我们面前”，为什么这么说？

刘登翰：在北大五年，虽有风雨，也有阳光，晴朗的日子还是多的。只是毕业要求回到福建，才知有一句“海外关系复杂”的判语，所谓“海外关系”也即“华侨关系”，被分配到闽西北山区二十年。从北大到闽西北山区，在一所即将散伙的只有百余学生的工专教语文，这个落差有点大。但我并未完全颓唐，相信一种“皮球”哲学，只要不泄气、不漏气，即使被压到水底，也还要浮上来。这个自我安慰的“皮球”哲学，让我战胜最初的失落和颓唐。半年后工专解散，我转了几个单位，最后调到一家报社当编辑。无处诉说也不愿诉说，相信这是命运；反过来想，天地茫茫，再艰苦再偏僻的地方也得有人去，为什么不能是我而一定是别人呢？这么一想也就平静下来。只是依旧不敢放松自己，每天坚持熬夜写作。二十年岁月漫

长而又短暂，既然一切都是命运，那就把它藏在心底，平静地过好每一天，一点点去战胜命运，让自己重新站起来。

羊城晚报：此前您主要从事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也做闽台区文化研究，这与华侨世家有关系？

刘登翰：是一种潜在的、情感因素的影响。所谓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国海外移民及其后裔的文学，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视野从海外知识者的专业写作，延伸到底层移民者的民间书写？从关注于移民的海外人生，兼及“侨”字下他们的眷属和社会的人生？这是一个新的课题，值得深入讨论。

羊城晚报：接下来还有什么写作计划？

刘登翰：我已八十六岁了，精神尚好，视力不行，几乎看不了书。几年前已把两万册书全部捐赠给厦门图书馆，决心不再进行需要大量阅读的学术写作，也没有个人的写作计划。唯一还能利用电脑读点信息，写点短文。偶尔也写写书法，当作一种快乐的游戏。

相信命运，战胜命运

□吴小攀

刘登翰记得，我是在北大首先迎接他的人。1956年，一个秋阳灿烂的日子，刘登翰来北大报到。我在中文系新生的名册中寻找那个名叫刘登翰的人——因为我知道，他是一名记者，热爱文学，而且写诗。登翰来自厦门，我们是大同乡，又有共同的爱好，见面自是欣喜。虽然不是同一年级，但因为志趣相近，交往日深，渐成知交。北大期间，我们一起进了北大诗社，在《红楼》又成了文友。后来六人集体写《新诗发展概况》，又在和平里《诗刊》为我们借来的中国作协宿舍“并肩战斗”了一个寒假。这些经历，更为我们的了解和深知奠定了基础。十年动乱的岁月，我们不愿回首。知道在各自的经历中都有难言之痛。所幸苍天怜我，劫后重逢，在各自不同的场合，我们又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和进步，一起呼吁。我们不仅是学术上的同道，更是心灵上的挚友。登翰近期完成了他的家族史的写作。他以单篇散文组合的方式，把一个华侨家庭和家族的历史，做成了一本大书。登翰文笔清丽，记叙简洁，加上他长于记忆，又做了扎实的案头工作，检索相关文史资料，从一个家庭的兴衰聚散，到一支家族的迁徙繁衍，他都有客观而翔实的叙述。因为涉及其中成员的“过番”“过番”，亲人们在远隔重洋的异国他乡，艰难创业，筚路蓝缕，山海空茫，在他的笔下均有着广阔

而充分地展开。这些人们之间的步履维艰，行踪漂泊，歧路荆棘，每一字都是汗水和泪水浸染而成。我阅读这些文字，从广阔的空间领悟到他们的迷惘和渺茫，又从叙述之细微处得到感同身受的酸楚与疼痛。

漂泊四海的福建人，为了谋生，把妻儿留在家乡，只身在海外奋斗吃苦，留下父母妻儿守着空房，造成了无数的家族悲剧。登翰书中展现的，仅是福建万千家庭中的一个“侧影”，但却也是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家庭悲剧的书写。

登翰是一个内心非常强大的人。他能够独立承受巨大的生存压力，包括歧视、伤害，甚至包括屈辱。他没有为这不公的遭遇向人倾诉。他对这种不公的“视若罔睹”，足以证实他内心的坚定和自信，他的承受与内展的能力足以抵抗来自外界疯狂的暴戾！作为出身华侨家族的登翰，他的心灵所受的伤害是不可言说的。但是他们都是真正的和真实的爱国者。

登翰书中写的，以及他有意略去而不曾写的，其实就是一部真诚的爱国青年(直至如今的暮年)战胜磨难的心灵史。登翰写出了一本家史，一本宗族史，就他个人而言，我以为他是写出了一部心灵史。他把内心的复杂和悲凉放置于人们觉察不到的暗处，而把明亮的色彩，以及内心的坚定与热爱展开在我们面前。

洞见

他从湘潭移民到珠三角，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将这些碎片整理汇聚，最终形成一部区域研究著作：《珠三角移民与城市化研究》

洞见

□瞿慧文

一部化“碎片”为整体的区域研究专著

不同以往的人类学区域研究

即使身在珠三角，我和许多本土人一样，对移民概念的理解都是碎片化的。这些“碎片”可能是偶然认识的工厂、小区的保安或扫地的阿姨。作为本地人，或许我们不会深究，不会探究这些移民群体从何而来，为何选择来到这里，又将何去何从。

然而，这些碎片化的印象与叙事通过周大鸣教授的研究得以凝聚。他从湘潭移民到珠三角，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将这些碎片整理汇聚，最终形成一部区域研究著作：《珠三角移民与城市化研究》。

这部著作从人类学的整体性出发，从人口流动、社会转型、社会网络、社会融合、社会空间等多个方面，展现了珠三角地区从传统城镇化向着工业城镇化和现代城镇化发展的壮阔画卷。他通过细致入微的叙述，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身影和生活融入了一个更大的历史图景之中，所呈现的不仅是个体的移民经历，更是一个群体、一个城市、一个时代的发展变迁。这样的研究视角和深度，让人不禁关注这些移民群体背后的故事。

从改革开放的时代脉络中，周大鸣老师早期的作品展现了珠三角地区乡村都市化的发展过程。人口迁移是城市发展的重要风向，人口的流动与聚集影响着城市经济发展的活力。因此，在周大鸣老师对于城市化过程的研究中，也包括了对外来劳动力的研究。

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乃至刘邵华的《我的凉山兄弟》，都是从孤立的村落出发，以小见大地阐释人文社科的理论。随着社会的发展，微观村落的研究分析受到了质疑和批判，促使人类学从单一的村落向复杂的、区域的整体研究转型。

经过三十载的研究积累，周大鸣老师向人们展现出了不同于过去人类学的区域研究作品。

揭示珠三角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珠三角移民与城市化研究》从导论开始即引出了作品最核心的一条主线——从地域社会到移民社会。开篇选择了从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角度切入，对珠三角地区的文化历史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让读者对珠三角地区的地域社会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也揭示了珠三角地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锋地区的历史特殊性和复杂性。外来人口为珠三角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和联系，增强了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互动与合作；然而，外来人口也带来了某些挑战和冲突。

例如，外来人口增加了珠三角地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压力与难度，融合和沟通方面也存在一些障碍和冲突，需要更加有效的社会政策和

措施来促进社会和谐；随着新能源汽车、5G通信、新型基础设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而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减少，这将进一步影响珠三角地区外来人口的规模和结构。

在乡村都市化过程中，宗族企业是由一个村落的宗族共同成立经济组织的代表。这些企业具有中国特色，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利用宗族关系和文化资源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信任、凝聚力，并提高效率和竞争力。然而，宗族企业在面对市场竞争和社会变迁时，也要克服宗族文化的弊端，实现宗族与市场、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与融合。

为学术界提供重要方法论参考

书中还开创性地研究了在珠三角导购中介商的生存情况，他们与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未连接或弱连接的空隙，这些空隙为他们提供了信息、资源和机会的优势。在珠三角导购中介商的社会网络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过客社会”这种新的移民理念，即他们既不完全融入当地社会，也不完全脱离原籍社会，而是在不同社会之间灵活地转换身份和角色，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需求。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二元社区”的概念贯穿对城市化发展历程的研究。这是周大鸣老师在2000年研究珠三角外来工时提出的一个创新性概念，指由本地人和外来人口构成的两个不同的社会系统，它们在分配制度、职业分布、消费娱乐、聚居方式和心理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和隔离，互不认同。“二元社区”理论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对珠三角地区移民与城市化发展的新视角和分析框架。

本书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对于珠三角地区移民与城市化的全面认识，也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参考，对于理解和对当代移民与城市化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微观

郭海鹰不迷信权威，对儒学史上一些不恰当的评价敢于纠正

敢质疑方能纠偏识心学

□刘红卫



《珠三角移民与城市化研究》

《珠三角移民与城市化研究》从导论开始即引出了作品最核心的一条主线——从地域社会到移民社会。开篇选择了从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角度切入，对珠三角地区的文化历史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让读者对珠三角地区的地域社会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也揭示了珠三角地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锋地区的历史特殊性和复杂性。外来人口为珠三角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和联系，增强了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互动与合作；然而，外来人口也带来了某些挑战和冲突。

例如，外来人口增加了珠三角地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压力与难度，融合和沟通方面也存在一些障碍和冲突，需要更加有效的社会政策和措施来促进社会和谐；随着新能源汽车、5G通信、新型基础设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而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减少，这将进一步影响珠三角地区外来人口的规模和结构。

在乡村都市化过程中，宗族企业是由一个村落的宗族共同成立经济组织的代表。这些企业具有中国特色，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利用宗族关系和文化资源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信任、凝聚力，并提高效率和竞争力。然而，宗族企业在面对市场竞争和社会变迁时，也要克服宗族文化的弊端，实现宗族与市场、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与融合。

为学术界提供重要方法论参考

书中还开创性地研究了在珠三角导购中介商的生存情况，他们与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未连接或弱连接的空隙，这些空隙为他们提供了信息、资源和机会的优势。在珠三角导购中介商的社会网络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过客社会”这种新的移民理念，即他们既不完全融入当地社会，也不完全脱离原籍社会，而是在不同社会之间灵活地转换身份和角色，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需求。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二元社区”的概念贯穿对城市化发展历程的研究。这是周大鸣老师在2000年研究珠三角外来工时提出的一个创新性概念，指由本地人和外来人口构成的两个不同的社会系统，它们在分配制度、职业分布、消费娱乐、聚居方式和心理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和隔离，互不认同。“二元社区”理论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对珠三角地区移民与城市化发展的新视角和分析框架。

本书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对于珠三角地区移民与城市化的全面认识，也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参考，对于理解和对当代移民与城市化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郭海鹰不迷信权威，对儒学史上一些不恰当的评价敢于纠正

敢质疑方能纠偏识心学

□刘红卫

代心学重镇”是目前学术界为数不多的有关江门学派的论著。

郭海鹰不迷信权威，对儒学史上一些不恰当的评价敢于纠正。例如，关于蒋信的学派归属问题。蒋道林早年跟随王阳明学习，后来改投湛若水门下，自称拜师湛若水之后才真正找到了儒学本体、体证的正确方法，学问大有精进。在其著述中明确称呼湛若水为“吾师”，而尊称王阳明为“先生”，由此郭博士断定蒋道林应归属江门学派，而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蒋信划归楚中王门是有问题的。这种敢于质疑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令人敬佩。

学界对陈白沙思想的评价历来不一，或认为其是濂洛后学，或认为其受佛教影响而流弊，或认为其受道家的影响。造成这种歧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研究者忽略了江门学派的元气理论。元气论是江门学派宇宙生成论的核心内涵，是构建其儒学本体论和工夫论的基础。郭海鹰花费大量篇幅阐释了江门学派的元气理论，从而为江门学派儒学的本体论和工夫论的诠释奠定基础。尤其是对江门学派随处体认天理、自然宗旨、致虚守静、勿忘勿助之间等工夫论说有独到见解，大多发前人所未发。

工夫论是明代儒学最精华的组成部分，特别是江门学派的工夫论体系，其完整性、精辟性都达到了儒学发展的新高峰，充分体现了儒学作为精义之学的特征。郭海鹰的《江门学派：明代心学重镇》一书正是以江门学派的修身工夫作为线索，为读者勾勒其学派学术思想的概貌，并努力呈现出其与姚江学术不同的心学特质，对研究明代儒学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江门学派与阳明学派是明代儒学史上两个重要的学术流派，他们在学术争辩与交融中将儒学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两家学派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体认路径、体证工夫方面：江门学派遵循随处体认天理的认知路径，以勿忘勿助之间作为重要的体证工夫；阳明学派则以致良知及正念头作为体证工夫的核心。王阳明认为随处体认天理求之于外，而湛若水则以为阳明学以致良知、正念头为核心的体证工夫偏于内，有歧出为“认知为性”的可能，从而导致流弊或狂肆。江门学派对阳明学中过度阐发体证工夫的易简性所产生的空谈心性的流弊的纠正，彰显了其在明代儒学发展史上中流砥柱的作用。

相较于近年学术界出现的阳明学研究热潮，对江门学派的研究略显门庭冷落，郭海鹰博士的专著《江门学派：明

家族史，也是心灵史

□谢冕

刘登翰记得，我是在北大首先迎接他的人。1956年，一个秋阳灿烂的日子，刘登翰来北大报到。我在中文系新生的名册中寻找那个名叫刘登翰的人——因为我知道，他是一名记者，热爱文学，而且写诗。登翰来自厦门，我们是大同乡，又有共同的爱好，见面自是欣喜。虽然不是同一年级，但因为志趣相近，交往日深，渐成知交。北大期间，我们一起进了北大诗社，在《红楼》又成了文友。后来六人集体写《新诗发展概况》，又在和平里《诗刊》为我们借来的中国作协宿舍“并肩战斗”了一个寒假。这些经历，更为我们的了解和深知奠定了基础。十年动乱的岁月，我们不愿回首。知道在各自的经历中都有难言之痛。所幸苍天怜我，劫后重逢，在各自不同的场合，我们又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和进步，一起呼吁。我们不仅是学术上的同道，更是心灵上的挚友。登翰近期完成了他的家族史的写作。他以单篇散文组合的方式，把一个华侨家庭和家族的历史，做成了一本大书。登翰文笔清丽，记叙简洁，加上他长于记忆，又做了扎实的案头工作，检索相关文史资料，从一个家庭的兴衰聚散，到一支家族的迁徙繁衍，他都有客观而翔实的叙述。因为涉及其中成员的“过番”“过番”，亲人们在远隔重洋的异国他乡，艰难创业，筚路蓝缕，山海空茫，在他的笔下均有着广阔而充分地展开。这些人们之间的步履维艰，行踪漂泊，歧路荆棘，每一字都是汗水和泪水浸染而成。我阅读这些文字，从广阔的空间领悟到他们的迷惘和渺茫，又从叙述之细微处得到感同身受的酸楚与疼痛。

漂泊四海的福建人，为了谋生，把妻儿留在家乡，只身在海外奋斗吃苦，留下父母妻儿守着空房，造成了无数的家族悲剧。登翰书中展现的，仅是福建万千家庭中的一个“侧影”，但却也是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家庭悲剧的书写。

登翰是一个内心非常强大的人。他能够独立承受巨大的生存压力，包括歧视、伤害，甚至包括屈辱。他没有为这不公的遭遇向人倾诉。他对这种不公的“视若罔睹”，足以证实他内心的坚定和自信，他的承受与内展的能力足以抵抗来自外界疯狂的暴戾！作为出身华侨家族的登翰，他的心灵所受的伤害是不可言说的。但是他们都是真正的和真实的爱国者。

登翰书中写的，以及他有意略去而不曾写的，其实就是一部真诚的爱国青年(直至如今的暮年)战胜磨难的心灵史。登翰写出了一本家史，一本宗族史，就他个人而言，我以为他是写出了一部心灵史。他把内心的复杂和悲凉放置于人们觉察不到的暗处，而把明亮的色彩，以及内心的坚定与热爱展开在我们面前。

失去的，和寻找到的

□洪子诚

登翰《侧影》中的这些文字在写作过程中，我就陆续读到，这次集又重读一遍。他用清丽、深情的文笔，写一个家庭在大历史中的兴衰聚散，写祖辈和父辈在异国的披荆斩棘、艰难创业，写母亲在艰难岁月中对亲人的思念和抚育子女的含辛茹苦，更呈现了叙述者在回顾这一切时的执着、诚挚的信念和心灵轨迹。

登翰在《侧影》这本书里，有许多笔墨深情地写他生活的城市厦门。当年在厦门，我曾寄宿登翰在中山路的家，尝过他母亲做的美味春卷。从他家步行不到十分钟就是鼓浪屿渡轮停泊的鹭江，沿着江边走道，曾听他关于生活、写作的计划，听他讲述爱情的幸福和苦楚……

自1956年9月我们同考入北大中文系至今，我认识登翰已经67个年头。他热情、感情充沛，好结交朋友，重情义，兴趣广泛，富于探索、开创的精神和能力。大学期间他学习成绩优秀，既写诗，写散文，也编写电影剧本，是北大学生“文艺界”的知名人士。我们入学后分配在一个班，五年里大部分时间也同住一间宿舍，无论学识和为人，我都从他那里学到很多。